

2016年5月25日 星期三 农历 丙申年 四月十九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您是第 2,651,742,445 位访问者

中国民族宗教网

讲中华万象 说民族风采
www.mzb.com.cn 欢迎进入中国民族宗教网

繁体

首 页 新 闻 民族宗教工作 理 论 民族文化 宗教文化 书 籍 期 刊 政策法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专 题

民族宗教社团和院校 民族宗教知识 学者作者 音 乐 视 频 图 集 中国民族报电子报 邮 箱 民族艺术

理论

宗教在一九七九

[来源: 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 2016-04-05 | 浏览 (11135) 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徐以骅



伊朗伊斯兰革命又称“1979年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让伊朗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阿富汗“圣战”武装分子。

推荐阅读

山西千年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各地清明过清明 绿色祭祀成...
领导人“点赞”的那些“舌尖...
海南黎锦传承人：用古老技艺...
青海世居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丛...
云南迪庆：“生态立州”筑牢...
看！少数民族战士如何练成”...
北京最古老的名刹：法源寺

环境差异影响或超越种族偏...
贵州积极推动少数民族电影...
研究表明：龙门石窟曾是武...
云端之上：丝绸之路的“宁...
“梨花源”与西夏党项的最...
“寒食十三绝”亮相陶然亭
《西藏传统农耕用具图典》...
发掘工匠背后的精神财富 ...

热点理论新闻

被盗佛首回归故里启示...
我国是历史文物古迹遗产的大国，
宗教文化遗产也十分丰富...[\[详细\]](#)

学诚委员：佛教功能是化世...
学者：宗教协会有必要设打...
正确区分民族风俗习惯与宗...
提倡孝道——本立而道生
如孝法师：如何用佛法提升...
牟钟鉴：弘扬君子之德
浅谈寺院的茶文化
追溯中国的素食文化

推荐理论新闻

社会对宗教需宽容 各...
宗教之于有着传统信仰的民族，可
谓血浓于水。历时长久的...[\[详细\]](#)

客家优良家风现代传承的启...
道教音乐是带有神威的点化...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认...
不同文化间的音乐理解问题
民族音乐学视阈中的音乐美...
宗教能化解科学一元化的困...
董阳：羌族民歌现状调查
美国印第安人音乐的“印第...

最新新闻

客家优良家风现代传承的启...
关于通道“非遗”保护工作...
女大学生的“干净”茶经



若望·保禄二世于1979年以教宗身份首次造访波兰。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奥巴马在新墨西哥州与当地女性举行“宗教圆桌”会议。会上，他向与会女性展示了其随身携带的刻有十字架的护身符。



自1980年开始重新印刷《圣经》以来，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对世界范围基督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图为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2012年11月8日一亿册庆典现场。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全球“宗教反叛”并非始于1979年，但1979年肯定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教宗若望·保禄二世1979年对波兰的访问，官方的理由是纪念波兰历史上最著名的圣徒圣斯丹尼斯殉道900周年；1979年11月，也就是美国驻伊朗使馆人质被扣的当月，是伊斯兰历法1400年新年的开始，根据伊斯兰教传统，该年是救世主马赫迪降临的日子，而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正是在这一年被许多伊朗什叶派民众奉为国家的救世主。1979年是充满象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重大事件从1月1日中美建交，以及中国包括宗教领域在内的对外开放，到该年圣诞节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束，以致于我们有充分理由，将其视为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年。

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从“韬光养晦”到“显山露水”，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其中，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可以说是全球宗教发展趋势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阿拉伯世界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和宗教民族主义的崛起。“许多愤怒的阿拉伯人从纳赛尔世俗的泛阿拉伯主义转向激进伊斯兰”，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不少年轻人，开始从伊斯兰主义甚至圣战

宗教在实际宗教工作本...
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关系及其...
创建星级宗教活动场所工作...
从农家乐到民宿经济的嬗变...
正确认识和运用国法与教规...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再探土家族摆手舞的起源...
什么是民俗...
藏族禁忌文化的积极意义...
传统村落保护什么 为什么...
清明节：拥抱自然的春天仪...

神学家那里寻求身份认同和政治方案，出现了地区性的伊斯兰复兴或“觉醒”浪潮。

宗教在当代国际关系上真正“登堂入室”的年份是1979年。该年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事件，意义十分深远。美国资深新闻记者克里斯汀·卡里尔在其2013年出版的著作《奇异的反叛者：1979年及其21世纪的诞生》中，把当年这五大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圣战”、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第一次回祖国波兰访问，以及中国展开经济改革——串联起来，认为此五大事件分别代表了长期被压抑的市场和宗教两股力量，造成了强烈的逆反和复仇，将历史的进程转到极其不同的新方向。因此，1979年被称为是“使专家狼狈、名嘴惊慌”的一年。作者认为，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活在1979年这一巨大变革之年的影响之下。

《奇异的反叛者》一书虽然语词犀利——将全球性的不同政治、社会和宗教事件串联起来加以评述，确实需要宏大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力，但也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缺乏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整体结构。不过，如果将专注焦点集中在宗教领域，那么从现在看来，1979年确实是在宗教上承先启后的关键年份。

这一年的国际宗教事件和运动

伊朗伊斯兰革命被视为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格局的第一次冲击浪潮，也是对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当头棒喝。伊朗伊斯兰革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现代神权政体，在国内扭转了以“白色革命”和“世俗自由化”为标榜的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进程；在国际上打出“既不倚东，也不靠西”的旗号，鼓吹“输出革命”，扩充其什叶派信仰版图，揭开了伊斯兰革命和当今世界“认同战争”的序幕，打乱并改变了中东乃至世界国际关系格局和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长期走向，把伊斯兰教推向了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

阿富汗“圣战”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阿富汗是逊尼派激进主义崛起的主场，而阿富汗“圣战”运动则是包括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内的几乎所有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源头，使政治伊斯兰思潮出现“圣战”化趋势，并在使地方“圣战”扩大为全球“圣战”的过程中，扮演着庇护所、训练营、指挥枢纽和“圣战大学”等重要角色。有“帝国的坟墓”之称的阿富汗先后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陷入难以脱身的泥潭，阿富汗战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导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波兰政治变局则代表着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另一个显例。197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第一次回祖国波兰访问，被认为是促成波兰政治变局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教廷和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方媒体，特别是梵蒂冈电台和由美国国会出资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波兰语部对波兰的舆论宣传和所谓公共外交，塑造了波兰民族深厚的天主教传统的国家身份认同，长期以来为促变波兰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铺垫。而此种“信仰攻势”在1979年6月2日至1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其出生国波兰为时9天的访问中达到高潮。这次访问过程中，据称在各种集会上聆听若望·保禄二世12次弥撒讲道和一些非正式谈话的波兰民众达1100万之众，几近当时波兰全国3500万人口的1/3。若望·保禄二世在这些讲道和谈话中，虽然回避直接批评当局，但他多次奉劝波兰人民“不要害怕”，“不要失去精神自由”，“不要在教会权利问题上妥协”，而要“加强建立在基督教基本价值观基础上的整个欧洲灵性上的团结”，为波兰的政治反对派势力提供了道义上的巨大支持。因教宗而发起的这些宗教集会在塑造波兰政治反对派的一整套语言、意识形态、符号、组织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为波兰团结工会的兴起、若干年后波兰的政治变局，乃至整个东欧剧变奠定了基础。后来，波兰某天主教记者写道：“若望·保禄二世的首次回乡朝圣之旅，如果不是根源，也是要求自由和主权的民族意识大进发的催化剂。”

在太平洋西岸的美国，以基督教右翼为主干的宗教新右翼，正在将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的“宗教觉醒”建制化和政治化，并于1979年6月正式成立了宗教新右翼旗舰组织“道德多数派”。道德多数派及其他超级宗教右翼组织，如“700俱乐部”、“宗教圆桌”，以及后来的“基督教联盟”、“家庭研究会”、“监狱团契”等成立后，迅速摆脱了此前保守宗教组织囿于南方的格局。他们在全国布点和设立分会，基层动员和上层游说一起抓，充分利用媒体和新型动员手段开展活动，迅速成为以信仰为基础的强有力的游说团体，揭开了美国保守福音派和宗教右翼大规模参政议政的序幕，改变了美国政治选举和政党联盟格局，使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均出现了“福音化”趋势。宗教新右翼全盛时期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甚至被指具有某些“神权政治”的表象，尽管近年来有衰退的迹象，但保守福音派和宗教新右翼驰骋美国政坛30余年，仍然是美国政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一国宗教的国际投射力不仅取决于宗教在该国的宗教人口、宗教基础设施、宗教的国内影响力和海外宗教布局，而且也受制于该国本身的综合国力，“宗教美国”就是美国同时作为世俗和宗教超级大国的综合体。始于1979年的美国宗教的这场“反叛”或“政治觉醒”虽然没有伊朗伊斯兰革命或苏东剧变那样剧烈，但其对美国

国内政治乃至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并不逊于前者。

中国宗教领域开始对外开放

中国宗教界在“文革”后的对外开放是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步的。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而非1979年，但1979年无论对中美关系还是对中国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对外开放，均具有重要意义。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30年之久的敌对状态；紧接着，邓小平副总理于1月26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就此次访问，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月29日，两国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正式会谈后，他在为邓小平举办的晚宴上，向客人提出了3点建议：印刷《圣经》、允许自主宗教活动、准许外国人传教。邓小平当即表示他将亲自过问前两项建议，但明确拒绝了最后一项。1989年，已卸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在埃默里大学讲演后回答听众提问时，也提到他在上述晚宴上的3项建议，称其中前面两项已付诸实施。

不少西方媒体和观察家把邓小平与卡特总统的此次会面视为促使中国宗教政策转向开放的直接因素。从时间上看，1979年4月8日，宁波基督教百年堂成为我国“文革”后全国第一个开放的教堂；1979年9月2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是上海最早恢复宗教活动的基督教堂；1979年8月25日至9月9日，赵朴初居士任团长、丁光训主教任副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访美，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三次大会，这是中国宗教在世界舞台的首次集体亮相；1979年10月31日，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阿訇安士伟率领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在“文革”后首次赴美加朝觐。

在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主要也是在此次访问后发生的。然而，在邓小平此次访美前，一些省份已逐渐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宗教活动也已开始复苏。以上海为例，1979年前，该市就已经恢复了宗教管理机构与宗教活动，并参与了越来越多的宗教外事活动。1978年1月，上海市委统战部会商有关部门，决定恢复玉佛寺的宗教活动，作为市级重点涉外开放单位；11月，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恢复活动；同月，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决定恢复上海市宗教事务局，让原宗教局一批干部回局工作。1979年1月9日，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叶尚志代表市委统战部宣读，对在“文革”中遭遇迫害的宗教界爱国人士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各级宗教事务部门、各宗教团体恢复工作。可以说，宁波、上海等地基督教堂的开放，以及印刷《圣经》，是“文革”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向全面改革开放、在宗教领域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因此，1979年初，中美两国领导人关于宗教问题的对话及后续活动，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在宗教领域的延伸而非启动。不过，此次访问也凸现了基督教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开启了1949年以来中美宗教高层对话，以及中美宗教公共外交的进程。

“国兴教和”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大宗教的健康发展也反映了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宗教多年来的旧面貌，也折射了强国崛起的新格局。就基督教而言，1979年后，显然已进入了中外互动频繁、交流方式多元纷呈、交流格局更为平等的“后传教时代”。在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基督教教会不仅在数量上（包括场所和信徒）有一定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包括神学教育、社会服务和教会制度建设等）也有显著提升。自1980年开始重新印刷《圣经》以来，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对世界范围基督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在所谓“后传教时代”，中西尤其是中美在宗教领域的博弈始终存在，宗教在国际关系上“促和与添乱”的双重或多重属性在中美关系上也有充分体现。不过，尽管有不少认识和实践误区，而且还面临着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威胁，但我国宗教的基本面向好，在我国社会和文化建设以及对外关系中日益发挥积极的作用。

1979年宗教变局的遗产

1979年，在中东、北美、中欧和中国均发生了宗教方面的重大事件及运动，这不仅对当时的地区和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席卷全球，给当前的世界政治和宗教格局留下了厚重遗产。

首先，1979年所发生的种种涉教事件和运动，标志着宗教对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回归。在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后，主权至上取代了神权至上，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在此种国际关系体系中，宗教逐渐走下“神坛”，在国际关系舞台尤其在欧洲地区不再“逞威”。然而1979年的涉教事件以及具有全球性的宗教政治化趋势，部分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定位，使长期以来“沉默的宗教”变成了“反叛的宗教”，而频繁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更是把反宗教极端主义提上了国际治理和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议程。1979年后，国际社会已经无法漠视宗教和宗教冲突给国际秩序带来的冲击，或坐视宗教极端势力的肆虐蔓延，而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对宗教“刮目相看”，摘下理性主义和启蒙主

义的有色眼镜，重新聚焦宗教。

其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世俗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力的下降和宗教认同影响力的上升，这使许多国家和政权开始从宗教传统中寻找合法性和社会整合的资源，也使不少地区的广大民众放弃传统忠诚而转向宗教信仰。

无论是革命前伊朗王室及其宗教反对派各自祭出居鲁士波斯帝国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旗号，还是波兰关于其民族身份认同是基于天主教传统信仰还是依附政治意识形态的两军对垒，或是美国政治和宗教左右两翼之间关于如何界定美国社会性质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战争”，1979年的这些宗教事件和运动都预示着全球范围“认同冲突”甚至“认同战争”时代的到来。在当前多元复合的认同结构下，宗教认同由于其作为具有广泛性、草根性、跨国性的强认同，有可能与国家认同产生对冲，从而成为各种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的涉教运动和事件所改变的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时至今日还大致存在。

第三，1979年的涉教事件和运动催生了各种非传统国际关系行为体。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曾将霍梅尼领导的以伊朗为代表的国际宗教势力与跨国公司、贩毒集团（可卡因帝国）等新型国际组织并列，称之为“全球角斗士”。这些新型国际关系行为体“向全世界宣告，民族国家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角色了”。除了罗马教廷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其他宗教非政府组织或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益增长，俨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大组织景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一样，这些跨国宗教行为体也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国家间和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传教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它们在国家、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或具有助推“颜色革命”的能量，扮演着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或在环保、发展、救援、健康等民生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或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构成世界维和力量，在各国对外关系中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重新启用。宗教和宗教团体作为公共外交载体的作用，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初露端倪，目前宗教公共外交早已成为各国外交工具箱中的必备工具之一。

第四，1979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再次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各国尤其是地区性和全球性大国需要具有驾驭世界性宗教事务和妥善处理涉及宗教的国际性治理问题的能力。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话来说，“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利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在处理国际性宗教问题上，尤其在应付宗教极端势力兴起的问题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进退无据、举措失当，结果深陷战争泥潭，始乱终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中东的乱局，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坐大的恶果。伊斯兰“圣战”运动使入侵阿富汗成为苏联的噩梦，从此苏联国力每况愈下，也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主因。

与其他地区形成对照的是，1979年是我国五大宗教在历经“文革”后全面开放的一年，并且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良性互动，这得益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全面贯彻，以及宗教管理工作日益走上法治化的轨道。宗教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并不为政府政策所左右，但宗教如何健康发展，成为社会中积极正面的力量，则与政府政策有莫大关系。目前，在我国的整体外交中，宗教民间交流和宗教公共外交（或称涉教公共外交）也正在扮演日益显著的角色。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思。

（编辑：司静）

[字号：大 中 小]

前一则：中国文物保护原则的演变与发展

后一则：女大学生的“干净”茶经

[\[我要评论\]](#)

[关于我们](#) [会员服务](#) [意见反馈](#) [联系我们](#)

 TOP

京备案号：京ICP备0505846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575号

中国民族报社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任何人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2003 中国民族报社信息中心  01082685337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民族报社



EMAIL-zgmzb@sina.com

